
緒論

一些對變局的分析

共產黨在東歐各國垮台，不單是一個政府的倒下，意義更為深刻的是，這代表一個政權的被推翻（不論推翻的動力來自執政黨內部，或源自外部，或兩者並存）。政府是由個別政客、政治派別或政黨所組成的；政權則代表階級統治。政府的更替可以完全不觸及政權的性質；相反，政權的改變是社會經濟結構中，階級構成發生轉變和階級力量對比出現變化的體現及結果。歷史經驗表明，沒有統治階級會自動放棄其統治。所以，政權的更迭往往以暴力作為舊政權的推翻、新政權的建立的助產士。

既然東歐巨變涉及政權的更替，這表示這些國家發生了階級統治的變化。中共和西方右翼人士視此為“資本主義復辟”。筆者向來認為這些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國家沒有任何社會主義性質。就這問題，有幾個不同的分析。（註1）但不論我們認為這些國家其實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基里夫、劉榮錦），或認為它們屬於官僚集產主義（卡路），或甚至認為這些國家中沒有統治階級，只有寄生於勞動群眾的統治利益階層存在（註2），我們都不能迴避，東歐巨變有階級統治產生變化的內涵。那末，我們得問，為什麼在大部份東歐國家，代表先前階級統治（或利益階層統治）模式的共黨政權，會自動放棄權力，退出歷史舞台？換句話說，為何先前的統治階級（或利益階層）會自動放棄其統治，因而使政權的更迭在大多數情況以和平方式進行？

對於從事歷史發展研究或社會運動的人，這問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可是，在筆者所接觸到關於蘇東巨變的不同分析中，沒有一個是沿著階級統治產生變化這方向進行探討的。

溫輝的分析

香港《爭鳴》月刊總編輯溫輝曾多次到東歐進行探索式旅行(註3)，對東歐情況有一定認識。他是極少數比較有系統地對東歐變化提出分析的論者之一。(註4)溫輝認為，東歐變局有六個成因。

一、經濟層面的因素。溫認為，雖然“斯大林經濟體系在一個短期間對工業生產能產生非正常的激發作用……但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確立，包括產權「公有化」、「國有化」，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人民在經濟生活上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滿足……就漸漸產生了對共產主義……的三信危機。東歐國家中，有些在戰前已經在資本主義的路軌上向著發達國家的方向前進，最突出的例子是捷克和德國，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一建立，就使這些國家大倒退，變成落後國家”。(註5)“東歐除了羅馬尼亞之外，一般都進行經濟改革，但始終沒有真正突破「社會主義」框框……於是，國民經濟就出現了種種弊病，接著就是難以排解的困局和險情。……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甚至危機，直接加深政治層面的矛盾，使人民的改革願望轉化為民運浪潮。”(註6)

二、政治層面的因素。人民“在政治生活上享受不到人權、自由、民主……漸漸產生了對共產主義……的三信危機。”(註7)“東歐國家在政治上一般都存在著兩種矛盾。一種是人民和共產黨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人民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鬥爭不時出現高潮。一種是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改革勢力的出現和加強，使統治集團嚴重分化。最近一個時期，一般東歐國家的兩種矛盾都有了發展，這是推動改革浪潮的重要動力。”(註8)

三、歷史因素。溫所指的是，蘇聯軍隊 1953年6月鎮壓東柏林人民運動、1956年10月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1968年8月鎮壓布拉格之春，在東歐人民心中造成的傷痕，“是癒合不了

的。特別是遭受過軍靴踐踏過或坦克蹂躪過的土地……地下的火焰是不滅的。在一定的歷史契機下就會爆發，事實上現在已經爆發了。”（註9）言下之意，東歐人民反對通過紅軍解放才得以掌權的共產黨政權，有爭取民族自決的成份。

四、西方思潮的影響。這是“東歐改革迅速發展的一個外在因素。提到西方思潮，人們便會想起資本主義。不過目前西方有一個有力的政治思潮，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可以說它在西歐、北歐、南歐泛濫……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東歐人民的影響是巨大的，雖然這是由來已久而不是從1989年才開始存在的現實。”（註10）

五、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溫指出：“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蘇聯對東歐國家內部事務實行不干預政策這個外在條件。……如果時光倒流，現在是五十或六十年代，波、匈的民主革命，肯定會粉碎在蘇聯坦克的履帶下……現在蘇聯所以持不干預態度，原因不止一個，但最主要的一個是：今天蘇共總書記不是1956年的赫魯曉夫，不是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而是1985年上台的戈爾巴喬夫。這位受過大學教育，拿了兩張高校文憑的總書記，有著斯大林以來所有總書記缺少的新思維。他的外交新思維的特點之一，是從謀求蘇美關係緩和、結束冷戰和軍備競賽的全球戰略出發，主張不干預他國內政。”（註11）

“戈爾巴喬夫的對外新思維中有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大家庭新關係」的原則，就是「每一個黨的自主性，它有權自立地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對自己人民負責」”。（註12）

溫對戈推崇備致，特別援引戈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就結束帝國立場及不干預他國內政（兩者為銀幣的兩面）的說法：

“是該結束從帝國立場出發看待對外政策的時候了。無論蘇聯，還是美國都不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鎮壓、強迫、收買、摧毀、破壞只能得逞於一時……當代普遍安全的原則基礎是承認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不干預他國內政……人民可以選擇資本主

義，也可以選擇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主權。”（註13）

六、「六四」的教訓。“東歐國家的一些統治層人物，在「六四」事件中汲取了教訓，知道用血腥鎮壓的手段只能收效於一時，但在全世界卻陷於孤立，而且終必遭慘痛的失敗，因而他們接受了權力的和平移交，或同意舉行自由選舉。東德昂納克的軍事鎮壓陰謀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粉碎的。”（註14）

除列舉上述六大因素，溫進一步指出，波蘭和匈牙利的發展，為整個東歐變革浪潮提供突破口，認識波、匈演變的因由，“是了解東歐變局的一把鑰匙。”（註15）

溫認為波、匈提供了兩個模式，“前者主要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筆者按：意思指團結工會的勝利），後者主要是從匈共自我改革開始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筆者按：匈牙利的變革沒有經過任何人民動員或鬥爭）。”（註16）

兩個模式的成功，有三個內在條件：

其一是“人民力量不斷壯大”。（註17）這就是上述經濟層面和政治層面兩個因素。人民一早便由於經濟的不滿足和政治的壓制，對「共產主義」不滿，“不時出現鬥爭高潮”，直至最近，“矛盾的不斷加深，終於導致事物的加速發展以至突變”。（註18）此外，上述的歷史因素亦可視作遠因，歸納於這一內在條件。

其二是“匈共、波共的改革勢力逐漸壓倒了保守勢力”。（註19）這就是上述的政治層面因素。溫指出，波蘭突變的主要動因，固然來自自由而上的工人運動，但若波共內沒有改革派提出妥協，事態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

第三是波共、匈共“曾採取比較寬鬆的政策，如匈牙利不逮捕持不同政見的魏京生型人物；波蘭政府在1984年頒布新聞法，給予報刊一定的新聞自由。這種政治氣氛有利於朝野改革力量的發展。”（註20）

前兩個條件是“互動的。如果共產黨內部的鬥爭超越另一個矛盾（筆者按：指人民與共黨的矛盾），就可能出現自上而下

為主的民主改革，如匈牙利就是。如果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鬥爭是主要矛盾，就可能出現波蘭那樣的、以自下而上為主的民主改革。”（註21）

除內在條件，還有一個關鍵的外在條件——蘇聯不干預，即上述第五個因素。

我們不得不同意，溫輝的論述是非常有系統的。他部份論點也是有根據的。但筆者認為，他基本上僅是圍繞著表面現象兜圈子。

首先逐一研究他的六大因素。

經濟層面的因素。從溫的論述，讀者得到的印象是蘇東各國經濟一向不濟事。事實上，這也是西方傳媒樂此不疲、大肆販賣的意識形態。例如，法新社一輯關於波蘭的報導結尾時說：這是“一個自二次大戰後一直受困於肉食短缺的國家。”（註22）又如，《經濟學人》1988年其中一期竟說蘇聯過去廿年，經濟一直沒有增長。（註23）事實是怎樣的呢？就法新社上述的報導，根據筆者手上的資料，以1971年至1975年為例，波蘭人均肉類消費由每年56千克升至70千克。同期，英倫三島的數字由50.4千克下降至46.2千克。（註24）就蘇聯的經濟增長，根據美國蘇聯問題專家愛·曉域特(EDWARD HEWITT)計算，蘇聯第六個(1961年至1965年)至第九個(1976年至1980年)五年計劃，淨物質生產(NET MATERIAL PRODUCT——不同於西方的國民生產，因折舊和很多服務性生產不計算在內)年均增長率順序為6.5%、7.8%、5.7%及4.4%(詳見第廿一章)。

根據幾年前出版的一本權威性東歐經濟史(註25)，從1948年至1968年，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先後為6%及7%。從1950年至1970年，東歐其他各國的平均數字為4.5%。這表示整個東歐的增長率與西歐大致看齊(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同期的數字順序為3%、5%、6.5%和7%)。

(註26) 更值得注意的是，與溫所說相反，東歐在蘇式國家資本主義建立後頭廿年，經濟表現比各國於兩次大戰之間，在西

式資本主義制度底下運作時為優勝：

東歐“於中央計劃實施頭廿年(1950—1970)達到的平均增長率，比兩次大戰之間最佳時期(1925—1949)達到的最高速率為優勝。最落後的兩個國家的增長率，與兩次大戰之間最佳五年期間增長得最快的兩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筆者按：下簡稱捷克)和匈牙利的增長率看齊。”(註27)

溫輝對上述應該不是一無所知，但不知為了什麼原因，他竟然首先把整整廿個年頭，稱之為短期間，繼而把蘇聯、東歐一度的經濟成就貶為令人費解的“非正常”。他說捷克和東德自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馬上大倒退，變成落後國家。根據筆者的認識，這與事實不符。拿東德做例，從柏林圍牆於1961年興建，堵塞技術工人大量流失開始，到1976年這15年期間，東德的經濟增長(平均每年為4.5%)比西德(年均為3.8%)為高。

(註28)事實上，東德於變局前為世界第十大工業國，人均收入為9,300美元。至於捷克，人均收入約7,400美元。與西歐較為貧窮的國家如葡萄牙(人均收入僅高於3,500美元)、希臘(僅高於5,000美元)等相比，又怎能稱為落後國家？(註29)根據西方學者研究所得，雖然“捷克的增長比西歐較成功的國家稍低，”

“大倒退”卻是與事實違背的說法；捷克“1938年人均收入約為法國75%，1980年差距大致相若。根據合理的估計，〔捷克〕已被意大利趕過，但比如英國這些發展緩慢的國家顯著優勝。”(註30)

筆者沒意思為東歐共產政權辯護，也無意否認東歐各國經濟出現很多問題，其中一些是體制性的。但若我們希望尋求真理，就必須首先尊重事實，不應把一些意識形態的偏見，當作常識般散播、渲染。

無可否認，八九巨變前，東歐多數國家都陷於經濟困境。溫說：“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甚至危機，直接加深政治層面的矛盾，使人民的改革願望轉化為民運浪潮。”誠然，經濟危機誘發群眾運動，是常見的情況。但東歐變局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

波蘭的經濟險況，於1988年夏天和秋天引發一浪接一浪的罷工，是導致變局的催化劑（第十七章會分析筆者為什麼用“催化劑”這個字眼）。匈牙利的經濟也陷於困境，但沒有觸發任何群眾運動。捷克根本就沒有經濟危機，群眾性的民運浪潮與經濟沒有直接關係。保加利亞出現外債困難，但政府未實行經濟緊縮，而變革是在規模極小的群眾動員底下進行及完成的，群眾運動的直接動因是生態問題。東德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發生變革的情況十分特殊，國外形勢變化起了主導作用。（註31）羅馬尼亞人民生活無疑困苦，但1989年12月的起義，民粹味道濃郁；軍隊調轉槍頭，更有政變成份，與溫上述公式（見附註31）勾劃出的情況，差別很大。

根據溫上述公式，事變發展的歷程，一般應該經過工人進行經濟性罷工（捷克1989年11月27日的罷工非經濟性），或再加上人民進行民生鬥爭才轉化成以推翻現政權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波蘭工運緣於經濟問題，但它在波變局僅扮演催化劑角色，跟表面印象相反，它其實不符合以上模式。其他各國變局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

當然，我們可以說，“人民在經濟生活得不到滿足”是遠因（溫亦有提出這個講法）。但這個提法否定了溫自己上述公式。況且，溫正確地指出，匈、波變局是整個東歐變革的突破口。匈比波更先出現變局。但這個對整個東歐局勢產生關鍵作用的發展，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與人民對經濟不滿（即使視之為遠因）沒有關係。波蘭的經濟性罷工不屬於遠因，故與當前論題無關。作為遠因，“人民經濟生活上不滿”在東德、捷克和羅馬尼亞三國牽涉廣泛人民動員的情況，應產生一定作用（但程度各國有別，因為如第廿八章分析，東德和捷克八十年代經濟相對穩定，人民生活有一定保障）。但東、捷、羅三國變局僅為從屬發展。要了解整個東歐變局的來龍去脈不能以該三國變局為依據。鑒於上述，顯然，即使作為遠因，“人民經濟生活上不滿”對我們理解整個東歐變局實際上無甚幫助。

可見，表面看來，東歐比西歐落後，人民享受不到西歐的生活水準，這情況很容易使人得到溫輝本身有一定邏輯性及道理的結論。但細緻分析下，不難看到，這原來是表面現象給予人們的一種錯覺。

政治層面的因素。溫指出兩種矛盾，“一種是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改革勢力的出現及加強，使統治集團嚴重分化。”共產黨內部改革派在變局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易於觀察到的事實。（註32）但問題是，為什麼會有改革派出現？為什麼改革派能夠擊垮黨內保守派？

溫亦有試圖解答這些問題：

“東歐國家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經過多年的實踐，會得到一些教訓。……高層面的認識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有所懷疑，甚至產生逆反心理和消極對抗。不管是哪一個層次的認識，都會產生民主意識，導向政治改革，政治多元化的觀點。其結果，就形成黨內的改革勢力。隨著他們認識的深化和人民鬥爭的開展，這種改革力量就會加強，甚至壓倒保守勢力。”（註33）

東歐（其實不單限於東歐）一些曾對現行「社會主義」有信心的人，終於對其有所懷疑，甚至完全放棄，是事實。例如，著名匈牙利經濟學家恩·科爾奈（JANOS KORNAI）於1986年一篇題為《匈牙利改革過程：想象、希望與現實》（“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註34）的文章，把五十年代的自己歸納於他稱之為“幼稚改革者”的範疇，並對他稱之為“激進改革者”（被其學術反對者指為夢想建立十九世紀式自由資本主義的一班匈牙利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意見表示支持。他在文末問道：

“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改革，是否可以比在匈牙利已達到的成效走得更遠呢？或現今的匈牙利大致顯示了改革的最終極限？……筆者必須坦白承認自己的疑惑。……作為一個間中被徵詢的顧問，他會嘗試幫助〔改

革〕過程朝向〔前面〕勾劃出的方向走。作為一個研究者，他保留懷疑的權利。”（註35）

但是，即使一些改革派以對現行「社會主義」的懷疑作為他們成為改革派的理由，以人們的主觀自覺作為解釋歷史發展的根據，顯然是唯心的方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說：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註36）

筆者認為，馬克思這個唯物（即客觀）分析法是科學的，不會因為那些掛「社會主義」羊頭、賣資本主義狗肉的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扭曲、玷污而不加思索地改變自己的看法。

共產黨進行經改，是為了本身作為一個統治階級的自身利益著想。但經改導致官僚幹部階級內部產生階級分化。改革派代表的，遠非局限於某一條經濟思想路線。相反，他們是官僚幹部階級內部一個特定利益集團或雛形階級的政治代表。這個改革派的唯物基礎，不取決於他們個人主觀意識。（有關上述，第三章有詳細論述。）

溫給予上述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改革派能夠打敗保守派？）的答案，更難以立足。何謂認識的深化？這根本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匈牙利改革派勢力最大，為什麼他們的認識比中國、蘇聯等國的改革派深化得更透徹、更迅速？蘇聯已建立現行「社會主義」超過七十年，為何蘇共改革派的認識反而不及匈共改革派深刻？在未解答這些問題前，認識的深化只能是空洞的。事實上，由於這是一個完全唯心的論點，這些問題根本就不可能在其自身範疇內獲得解答。

溫說人民鬥爭的開展強化了改革力量。這是否必然的呢？中國八九民運和捷克布拉格之春顯然不屬於此例。具體就東歐變局而言，匈牙利變局不涉及群眾動員，溫以上說法自然不合用。至於波蘭，如下文有關波變局的分析指出，改革派佔上

風，主要緣於波共政權階級屬性有所轉變。若非如此，規模比1980年遠較為小的1988年工運，能引至什麼發展，只能是未知之數。有關東、捷等情況，事變為從屬的發展。倘使沒有發生波、匈變局，相信亦不會出現民運浪潮，換句話，亦不會有人民的鬥爭去“強化改革力量”了。

繼指出兩種矛盾後，溫續說：“最近一個時期，一般東歐國家的兩種矛盾都有了發展，這是推動改革浪潮的重要動力。”這是對事態發展的貼切敘述，但不構成分析。問題是，為什麼官僚集團的分化(或曰改革派的加強)有所發展？如剛指出，溫有關這點的答案完全站不住腳。至於人民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溫的論述一定程度上切合了波蘭的情況(雖然他不明白波蘭工運的真正角式)。但就另一個突破口匈牙利而言，由於沒有出現群眾動員，自然無從談什麼發展了。

總結之，溫看到事物表象的演變(如改革派的形成及強化)，他亦有試圖在深一個層次解釋這些現象，但卻只能提供一些唯心的、完全缺乏客觀基礎的論述。

歷史因素。筆者同意，東歐一些國家的群眾運動，有爭取民族自決成份(但這是次要問題)。也贊同蘇聯對一些國家的發展採取不干預，是一個關鍵條件，這點留待後面討論。至於溫說：“地下的火焰是不滅的。在一定的歷史契機下就會爆發。”問題是，我們需要解釋的，正正是為什麼這歷史契機在1989年出現了。

西方思潮的影響。溫輝說“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歐、北歐、南歐，現在更也連帶在東歐泛濫。事實是否如此？

過去十多年來，西方的大趨勢是右翼政黨執政(當然有個別國家例外)。極端保守，甚至反動的戴卓爾主義成為政圈以至學院／學術界的時尚。以米·費里民(MILTON FRIEDMAN)為最出名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在經濟學界成為主導，凱恩斯主義幾乎無處棲身。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不能被視作“民主社會主義”泛濫。

戴卓爾主義其中一條主線，是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不單右翼政黨執政的國家，即使社會黨當權的法國（社會黨人密特朗任總統，現任總理羅卡爾(MICHEL ROCARD)亦為社會黨人)也被私有化浪潮波及。但根據溫自己給予“民主社會主義”的定義，“主要經濟部門實行公有制和國有化”包含在其中。(註37)溫並明確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是第二國際的理念。一條路線鼓吹主要經濟部門國有化，另一條相反鼓吹復辟十九世紀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兩者如何能夠混在一起，二合為一，筆者是無法理解的。

另一方面，“民主社會主義”是否席捲東歐？根據筆者的淺薄認識，情況不是這樣。眾所週知，團結工會於1980年成立時，政治取向深受鼓吹左翼路向的工人自衛委員會影響，對於市場經濟，明確加以否定。但自1981年，尤其是於軍管後，團結工會的領導層及知識分子，政治經濟思想上開始有所改變。到1984年，“「產權理論」成為華沙的熱門論題……不久，連顯著激進分子如史丹尼斯吉斯(STANISZKIS)也變成私人資本的熱切擁護者。”(註38) 團結工會政府 1990年1月開始實施的“休克療法”經濟改革，是根據特別顧問，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耶·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建議而制訂的，並得到國際貨幣基金會首肯。改革對工人階級生活的打擊，遠遠超過以前波共的做法，與第二國際的路線，背道而馳。

再以匈牙利的情況為例，知識分子成份最高的自由民主派聯盟(FEDERATION OF FREE DEMOCRATS)，是戴卓爾主義的擁護者。

就1990上半年東歐其中一些國家的選舉結果而言，右翼的德國聯盟(ALLIANCE FOR GERMANY)在東德大捷；匈牙利中間偏右的民主論壇獲勝，上述的自由民主派聯盟第二。在這兩個國家，代表第二國際或相近路線的力量，潰不成軍。最悲慘為東德的新論壇(其中包括不少左翼流派)。這個1989年群眾運動的前衛組織(當時，德國聯盟的主體，基督民主聯盟還是德共的衛

星黨)領導的九零聯盟,僅獲不足百分之三的選票。在東德於八九事變後一度興起的第三條道路哲學 (THIRD WAY PHILOSOPHY——既非東歐變局前的制度,亦非西歐的體制),出現了不一陣子,便胎死腹中,無疾而終。

事實表明,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非但沒有泛濫歐洲,相反,過去十多年來,它一直節節敗退。把其所謂“泛濫”作為東歐變局成因之一,實在很難叫人人信。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溫輝指出,戈的新思維有兩個主要方面。其一是“結束冷戰和軍備競賽”。就歐洲而言,其理念為“建立「全歐大廈」”,“取得西方的信任,以便實現蘇聯的裁軍計劃和解散北約、華約的建議。”(註39)第二方面是,“建立「社會主義大家庭新關係」”,對東歐各國內政實行不干預,即使後果為“資本主義的復辟”。恕筆者直言,從溫的論述,受過高深教育的戈爾巴喬夫,委實有點像一位從天而降,拯救世界的和平使者。“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這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以戈的主觀自覺/意識作為判斷蘇東變局的基礎,未免有點粗淺的英雄史觀味道。我們知道,假使歷史是由英雄所創造,根本就沒有解釋/分析歷史的需要,因為英雄的出現,可遇而不可求,用數學的術語來講,是一個隨機(RANDOM)的情況。

為什麼會出現戈這位「和平使者」?為什麼其新思維有如此內容?不先解答這些問題,以蘇聯不干預作為東歐變局的條件(一個可以觀察到的表面現象),雖屬正確,但無甚科學意義。(確切地說,蘇只是對一些國家(匈、波)採取不干預,對東德和捷克,甚至對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蘇其實有直接插手。)

溫輝是一個對唯物史觀有認識的論者,故此,他亦覺察到英雄史觀的貧乏。他了解有需要為戈爾巴喬夫的出現找尋唯物的即客觀的解釋。就為什麼戈在蘇聯進行改革,溫指出:

“蘇聯〔經濟〕實際上已經墮入困谷底部，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而戈爾巴喬夫則是蘇聯改革派的傑出代表，蘇聯的現實產生了這樣一個改革家……。”（註40）

溫的說法與事實不符。1990年以前，蘇聯經濟沒有“墮入困谷底部”；直到1989年底，換句話，在戈上台後頭四年半，蘇聯經濟仍相對穩定。戈的政策確實與經濟問題有密切關係。但我們必須要有符合事實的根據，才能就這種關係作出準確的論證。

就蘇聯的對外新政策，溫指出：

“一般政論家都認為，戈爾巴喬夫銳意和美國談判裁軍，旨在節省軍事開支，緩解蘇聯財政經濟危機。這個看法當然是不會錯的。”（註41）

不錯，這是顯而易見的。雖然溫沒有就這與蘇聯對部份東歐國家不進行干預的關係，給予解釋和說明，顯然，進行干預，就無法結束冷戰，蘇聯便無法節省軍事開支。但問題可非這樣便解決了。採取不干預，任由東歐自由發展，豈非危害蘇聯從東歐獲得的經濟利益？換言之，節省軍費看來其實是有經濟代價的。究竟蘇聯這個成本——得益算盤是怎樣打的？單著眼一方面的得益，卻不計其成本，似乎有妄下結論的成份。

「六四」的教訓。東歐變局以波蘭和匈牙利為突破口，另以蘇聯對波、匈不干預及對其他四國的插手為外在條件。匈牙利變局其實已開展了幾年，只不過到1989初，步伐加快，量變發展成質變。1989年1月11日，匈國會正式批准反對黨的成立。2月，匈共中委會平反1956年十月起義。5月，納吉(IMRE NAGY)獲平反。以上都於六四前發生。況且，就匈局而言，根本沒有群眾動員，自然也沒有決定是否鎮壓的問題存在。

至於波蘭，波共中委會於1989年1月通過把團結工會合法化。2月6日，政府和團結工會的圓桌會議展開。4月5日，雙方達成協議。而半自由選舉，剛巧在6月4日舉行。

假使蘇聯要干預匈局，最合邏輯的時間是1989年2月1956年

起義獲平反後。但相反，戈於 3 月會見匈牙利總理米·藍馬夫 (MIKLOS NEMETH) 時，對匈共打算實行多元化多黨制予以支持。(註42) 同理，蘇聯不干預波局的決定，顯然早已作出，與六四拉不上任何關係。

可見，東歐變局最關鍵的發展，統統發生在六四之前，與它沒有絲毫關連。即使六四後的發展，也和所謂“六四的教訓”無關。到東德事態突變時，東歐整個形勢，已發展到河堤全面崩塌之局。10月7日，正當東德慶祝立國四十載，匈共自行解散，成立社會黨代替。此前，8月23日，馬佐維耶茨基出任波蘭總理。9月12日，團結工會領導的聯合政府成立。就東德國內局勢而言，匈牙利繼5月2日的舉動(見註31)於9月11日子夜開放與奧地利接壤的邊境。接著三日，超過一萬五千東德人取道匈、奧往西德。到10月突變前夕，逃亡人數已突破五萬。國慶日，戈爾巴喬夫應邀出席，卻向東德領導人警告，不得採取鎮壓。在上述形勢下，即使沒有六四，鎮壓顯然也不會發生。至於捷克的情況，根據事後披露出來的消息，全世界在電視新聞片看到的所謂“11月17日屠殺”，原來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份參與策劃的計謀，藉以推翻雅克什(MILOS JAKES)。從頭到尾，相信除雅克什外，無論是否發生過六四，鎮壓從未被列入考慮範圍。

溫輝指出波、匈變局是整個東歐轉變的突破口，這點非常正確。他認為波、匈兩個模式，有三個內在和一個外在條件。

考察一下這三個內在條件(外在條件前面已論及)。

一、“人民力量不斷壯大”。這點在前面分析溫六大因素中的經濟層面和政治層面因素時，已論及，此處不再重覆。

二、“匈共、波共的改革勢力逐漸壓倒了保守勢力”。前面指出，問題是，為什麼出現改革派？為什麼改革派逐漸壓倒了保守派？如前所述，溫有關答案不能令人滿意。

三、波、匈較寬鬆的政治氣候有利於朝野改革力量發展。問題是，為什麼波、匈的政治氣候較為寬鬆？顯然，這本身與黨內改革力量出現和強化有關。可見，溫在這裡觸犯了循環論

証(CIRCULAR REASONING)之大忌——黨內改革力量的出現和強化有利於黨內改革力量發展。

有關前兩個條件的“互動關係”，問題是，在什麼條件下，一種矛盾會超越另一種矛盾？溫正確地指出，在匈牙利，第二種矛盾(第二個內在條件)超越了第一種矛盾，因而產生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就匈改革派的出現及強化，和它之能夠擊垮保守派是基於什麼因素這些問題，溫卻無法給予滿意的解釋。

至於波蘭，充滿戰鬥性的工人運動這個因素是顯而易見的。但眾所周知，1988年的工運規模絕對不能與1980-81年相提並論。為什麼波共1981年會實行鎮壓，而1989年工運壓力遠較為輕的情況下，反而作出讓步？不首先解答這個關鍵的問題，波蘭變局始終是一個謎(按：蘇聯不干預僅為因素之一)。溫輝似乎沒有察覺這個問題，所以，他就波局的論述經不起深入的探討。

最後，溫輝認為：

“這是階級鬥爭色彩不鮮明的革命。按照馬列主義的定義，革命是一個階級(如工人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如資產階級)的鬥爭，而東歐各國的革命，一般都是全民性的，即不是某一個階級為主所進行的鬥爭。波蘭團結工會不是單單代表工人階級，這是以工人、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有全民性質的組合，成員中還有大批共產黨員。這個組織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註45)

首先，就波局而言，溫有把事實扭曲之嫌。我們不用接納馬克思主義，也明白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不構成獨立的階級。不然，我們便需要接受另一種階級統治學說了，因為政府永遠是由政治活動家(其中很多是知識分子)組成的。波蘭的群眾運動是一個工人運動，這是不爭的事實。是什麼原因使溫硬把它說成是所謂全民性的運動？

筆者認為，溫把東歐各國變局籠統地視作“一般都是全民性的”，其潛台詞是否定階級分析。階級分析對歷史的研究，以社會階級構成、階級利益矛盾，以至衝突和階級力量對比這

些因素為基礎。歷史發展是這些因素起變化的結果。階級利益對照於所謂全民(或國家)利益。根據階級分析，所有歷史發展，首先促進了某一特定階級的利益，而非空泛的或抽象的全民利益。一些其他階級也可能會因此而在某些方面得益，但那是副產品。溫扭曲波蘭的情況，不過是企圖說東歐各國變局都是代表全民利益的。他以為，只要運動屬於全民性，它一定代表全民利益，而非階級利益。

事實上，即使一個運動或革命得到全民參與，也並不表示它沒有階級屬性。1789年法國大革命便是經典例子。它是歷史上少有的全民革命，但這不改變它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註44)

下文分析，不從階級分析角度出發，是無法理解為何波共同意和平地退出歷史舞台的。匈牙利變局沒有涉及群眾動員，自然談不上什麼“全民性的革命”。事實上，要明白匈局的由來，也必須以階級分析為基礎。誠然，東德、捷克和羅國的群眾運動，都有強烈民粹色彩。但如溫自己正確地指出，整個東歐變革的關鍵，在於波、匈變局。進行分析需分主次，切忌把從屬誤作主體。一旦波、匈變局的成因得到確定，我們對整個東歐變革的理解，就不會被東、捷、羅三國易於迷惑人們視聽的情況擾亂。再者，第廿九章分析，東、捷、羅三國變局為什麼以民粹運動形式出現，也只有從階級分析才能得到解答。

總結之，溫輝說“東歐各國的革命，一般都是全民性的”，首先在波、匈的情況，與事實不符。他本末倒置地以東、捷、羅三國情況來涵蓋整個東歐變局，其實是把自己以波、匈作為突破口的正確提法否定。他以為東歐變局否定了階級分析，只是由於他的分析視野只及事物表象，因而未能在深一個層次揭示產生變局的真正因素。

蘇紹智、蕭小明的分析

1990年1月29日至2月3日，香港《明報·自由論壇》一連

六日刊載蘇紹智、蕭小明的評論文章《從蘇聯、東歐變革看中國民運》。顧名思義，蘇、蕭的文章(下簡稱蘇文)，旨非直接就蘇東變局作出分析，而在於從變局中領悟有關中國民運的啟示(主要是八九民運為何失敗)。顯然，若要從變局有所領悟，自不然需先對其成因及成功因素有所了解。所以，雖然蘇文目的不同，但仍與本文主題有關。事實上，除溫輝的分析外，它是另一篇較為系統性的論述。況且，有鑒於蘇紹智學術上乃至在中國民運思想界中的地位，蘇文更添重要性。

可能是由於蘇文目的不同，它關於蘇東變局的分析，是高度概括性的。但蘇、蕭是嚴肅的論者，不會因此而犧牲分析的準確性。

蘇文把蘇東變局分成兩類。蘇聯的自上而下變革為一類，東歐的自下而上模式為另一類：

“為什麼蘇聯可以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為什麼東歐各國可以自下而上的推動政治改革？”(註45)

這個二分法顯屬錯誤，因為匈牙利變局非循自下而上軌道。甚至保加利亞的情況也不構成自下而上模式。但蘇文顯然把匈、保歸納在這模式：

“東德的昂納克、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捷克的雅克什、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及匈牙利的卡達爾，其之所以不得不從強硬轉為妥協、退位……。”(註46)

不錯，蘇文於另一處提及：

“匈牙利共產黨幾十年自我改革的歷史最後走向了自我否定，共產黨一黨專政仍要讓位予民主制度。”(註47)

雖則如此，以上一句引文不是要就東歐各國不同情況加以區別，而僅在於對蘇聯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否挽回一黨專政，提出疑問。

蘇、蕭把東歐各國的變局，一律視作民運浪潮席捲東歐的結果：

“民主運動的浪潮已洶湧澎湃，勢不可擋地橫掃了整個東

歐各國，保守、強硬的當政者紛紛垮台。”（註48）

他們沒有看到，東歐變局是有階段性的，首先是波、匈出現突破，繼而激起東德、捷克和羅馬尼亞的民運浪潮，和觸發整個東歐的變革。他們在單獨討論波局時，當然有論及波蘭工運，但在談論整個東歐變局時，他們的焦點卻全部集中在1989年10月掀起的群眾運動。剛才一段引文所指的民運浪潮，是單指這股運動的。以下是這段引文整句：

“正當東歐頑固執政者們贊譽中共為共產主義堅定捍衛者之聲未落，民主運動的浪潮已洶湧澎湃，勢不可擋地橫掃了整個東歐各國（筆者按：即包括波蘭和沒有群眾動員的匈牙利），保守、強硬的當政者紛紛垮台。”

到六四時，波蘭已渡過群運階段，變局已初步塵埃落定。六四後的浪潮當然只能是1989年10月至12月的群運。換言之，蘇、蕭把這個浪潮之前發生的事情，也視作它的產物。筆者不以為這僅屬行文不小心，因為在文章另一處，蘇、蕭再犯了同一錯誤：

“當1989年東歐民運再次掀起時，強硬當政者……最後引咎退位，讓權予改革勢力。如東德……再如捷克……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更是一反常態，明智地讓位歷來遭受鎮壓的團結工會組閣……。”（註49）

雅魯澤爾斯基是於1989年8月17日邀請馬佐維耶茨基組閣的。波蘭的群運階段主要在1988年。到1989年頭，罷工已開始退潮，事態已發展到另一階段。雅及另三名波共領導人於1月向中全會提出與團結工會召開圓桌會議，若不被接納，四人將集體辭職。2月6日，圓桌會議正式展開。上引所指於1989年再次掀起的民運，顯然是該年10月開展的運動。怎麼蘇、蕭會把事物的先後次序和因果關係（波局為突破口，引發10月開始的民運浪潮，現卻反過來被視作該浪潮的結果）顛倒呢？

一般人被1989年10月至12月的變化迷惑視聽，很容易會就此浪漫地假定該段期間的民運浪潮，是整個東歐變局的成因。

筆者不便胡亂猜測蘇、蕭是否犯了同一錯誤，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蘇文就東歐的分析，似乎是稍為輕心的。一個很矚目的例子是：

“東歐各國強硬派執政者，如東德的昂納克……及匈牙利的卡達爾……一旦失去了蘇聯紅軍的支時，面對強大的……社會反對力量……便……失去了自信。因而，當1989年東歐民運再次掀起時……最後引咎讓位，讓權予改革勢力。”（註50）

不談匈局非產生自1989年10月掀起的民運這點，卡達爾並非於1989年才下台。1988年5月，匈共召開黨代表會議，由格羅斯（KAROLY GROSZ）接替卡達爾黨總書記職位，卡被名升實降地「擢升」為虛無實權的黨主席。1989年5月8日（請留意，這也是在10月前），卡的黨主席和中央委員兩個職位也被革除。可見，卡讓位的時間，不是1989年5月，更不是1989年10月或之後，而是1988年5月。

由於蘇、蕭把整個東歐變局視作1989年10月至12月的群運浪潮的結果，所以，他們在探求變局成因時，視野便局限在該浪潮上。再者，由於他們看不到變局的階段性質，他們自然忽略了這個浪潮本身，其實衍生自先於它發生的波、匈變局。由此，蘇、蕭在探索上述浪潮的起因時，就不得不停留在空泛、抽象的水平了。

蘇文說：

“民主運動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興起，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制度合法性的喪失所致……要維持政權的合法性，要求當政者不僅要充份滿足人民經濟生活的需求，又要充份的滿足人民政治生活的民主和自由……幾十年的統治的結果證明，正由於嚴重地壓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正由於取消了人民最基本的民主自由的權利……正如波蘭工人的大罷工所抗議的，不能保障生存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正如羅馬尼亞人民所喊出的，與其在暴政

下屈生，不如拼死來抗爭。”（註51）

又：

“在東歐，經濟危機深刻之極，更是襯托了政治的腐敗，激化了政治反抗，波蘭、羅馬尼亞可謂最突出（筆者按：最突出表示並非例外）的兩例。”（註52）

另：

“東歐民運的迅猛高漲，是由於經濟的極度惡化，政治的極度壓迫帶來了社會與政府矛盾的極度尖銳化，發展到了人民經濟上不能生活下去，政治上不能忍受下去。”（註53）

東、捷沒有“深刻之極”的經濟危機。保未實行緊縮。匈人民沒有“反抗”。作為東歐最後一塊多米諾骨牌，羅變局無助於我們理解整個東歐變局的由來。只有波局與“人民經濟上不能活下去”有關，但波工運僅為催化劑。蘇文以為東歐出現變局“是由於經濟的極度惡化”激發人民反抗實為一個誤解。

至於人民“政治上不能忍受下去”這點，誠然，1989年10月至12月在東德、捷克和羅馬尼亞出現的充滿民粹色彩的民運浪潮，顯然是人民長期遭受壓制下積聚起來的不滿，在一定的契機，爆發出來。但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一定的契機。它為什麼會出現？是什麼導致它於1989年出現？換言之，這就是前面所說，勿把從屬（上述民運浪潮）誤作主體（波、匈變局創造出整個東歐突變的形勢）。

有關蘇聯在東歐變局扮演的角色，蘇文指出：

“更為劃時代的是，蘇共還宣告了“勃烈日涅夫主義”和“有限主權論”的撤銷，對使用蘇軍坦克幫助東歐共產黨保守勢力鎮壓民主改革運動的蘇共霸權予以自我否定。同時，蘇共成為了東歐國家改革的支持者。”（註54）

可惜得很，文章完全沒有就蘇聯的新東歐政策的形成加以解釋。就蘇聯為何在國內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蘇文的分析是：

“正是因為政治矛盾的極端突出，迫使蘇聯進行先人為主爭取主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以免陷入類似使東歐各國政府無法自救的社會民主運動巨浪之中。”（註55）

這是另一個連最基本事實也搞錯的例子。戈爾巴喬夫是於1986年提出“開放”、“重整”政策的，怎能把發生於1989年的事情視作其誘因？就為何會出現改革派和這代表什麼，蘇文僅說了幾句：

“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其領導成員的地位上升，多屬於在鞏固和建設時期的突出資歷……改革派注重實際，注重世界新潮流。他們的自身利益和權力根基，取決於不斷的創新和成功的改革。”（註56）

從字裡行間，可以推斷，蘇、蕭就改革派的出現，應該持有類似溫輝那以人的主觀自覺為依據的理解。就上引最後一句，當然，成功的改革無疑有助於鞏固改革派的地位，因此，進行改革是其切身利益所在。在任何國家，所有政客都以自身的政治利益行事，這點不講自明。不過，政治活動家及政黨，不外是階級的政治代表，所以，雖然他們的主觀動機為自身的政治利益，其行為是有客觀基礎和規範的。就現行「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共產黨各級領導，屬於官僚幹部階級的政治代表，其利益的維護者。但東歐巨變中，改革派（以匈共改革派最為突顯）進行的改革，看來卻把官僚幹部階級的利益徹底出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否改革派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竟然調轉槍頭，背叛自己先前所代表的階級？若然，其行為豈非全無客觀基礎？那我們又應如何理解沒有客觀基礎的主觀動機？根據溫輝的“實踐帶來認識”論，東歐改革派是出於對所謂國家整體利益的承擔，而決定犧牲官僚幹部階級的利益。換言之，是個人良知和理性驅使他們這樣做。不過，但凡論者需要搬出個人“良知”或“理性”這類範疇，只表示他出於沒法為人的行為提供客觀分析，被迫放棄科學態度罷了。

可見，東歐改革派的出現及其「倒戈行為」，是很重大的

理論問題，決非一句“改革派注重實際……他們的自身利益和權力根基，取決於不斷的創新和成功的改革”可以解答。

前面分析，溫輝以“認識的深化”來解釋為什麼東歐改革派能夠打垮保守派，是站不住腳的。就改革派的勝利，蘇文頗著意地對比改革派在中國和蘇聯的不同情況。

首先，蘇文認為：

“共產黨內的強硬派，其核心多屬於政權創建的元老，他們是這一制度最堅決的捍衛者，他們的切身利益與之共存亡。”（註57）

眾所週知，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把一整代老布爾什維克幾乎殺清光，餘下來的，縱使是十月革命前入黨，他們對開國的貢獻，與鄧小平，甚或王震在1949年解放所扮演的角色，無可比擬。換言之，在過去幾十年間，蘇聯根本已再沒有如中共現今的所謂八老般的元老勢力存在。那蘇聯這期間的強硬派又來自哪裡？

蘇文於另一處提供了答案：

中共“黨內的強硬勢力與元老勢力結成聯盟”。（註58）

原來，上述所說“強硬派，其核心成員多屬……元老”是不確的，強硬勢力與元老勢力其實屬於兩個不同的勢力集團。只不過，根據蘇文假定，元老勢力，為了自身利益，必定支持強硬派。正所謂“打天下者坐天下”。

為簡化問題起見，我們姑且接受“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邏輯。那麼，不是元老的強硬派又根據什麼基礎產生？這點蘇文並沒有論及。

跟著，就中、蘇改革派的成功失敗，蘇文說：

“正因為元老勢力的控制，使得中國的改革派不能像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那樣，可以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強有力地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蘇聯黨內，元老已所餘無幾，剩下的幾個也成了孤家寡人，可以被戈爾巴喬夫輕而易舉地清洗。”（註59）

如前所述，過去幾十年間，蘇聯已沒有元老勢力存在，但蘇文竟以此為分析蘇改革派成功的範疇。再者，蘇文本身指出，元老勢力與強硬勢力是兩個不同勢力集團。可是，雖然蘇文一方面於不存在的元老勢力上做文章，它另一方面卻完全沒有提及蘇聯強硬派，更遑論為我們解釋是在什麼條件下，它被改革派打敗。

縱觀上述，可以看到，蘇文除申述了一個表面現象（戈爾巴喬夫能控制黨政軍）外，它實際上沒有就蘇聯改革派的興起及成功因素進行任何分析。

就東歐改革派的成功，蘇文說：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東歐各國的強硬執政者，如東德的昂納克、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捷克的雅克什、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及匈牙利的卡達爾，其之所以不得不從強硬轉為妥協、退位，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是戰後在蘇聯紅軍幫助下建立的，並沒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傳統，這一外來的共產制度，始終受到了東歐社會固有的宗教文化勢力和民族敵對情緒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在這環境中，東歐共產黨的強硬統治者，一旦失去了蘇聯紅軍的支持，面對強大的、相對有組織的社會反對力量，如波蘭的團結工會和天主教會，便自覺孤立無援而失去了自信。因而，當1989年東歐民運再次掀起時，強硬當政者調用軍隊鎮壓的企圖無一不遭到黨內改革派的強有力制止而不果。最後引咎退位，讓權予改革勢力。如東德，正是被昂納克派往中國祝賀天安門軍事鎮壓的，主管東德安全的克倫茨堅決抵制了昂納克1月9日的鎮壓命令。再如捷克的共產黨總書記雅克什極力要採用「中國解決方式」予以武力鎮壓，但不出一個月，民運就把他轟下了台。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更是一反常態，明智地讓位予歷來遭受鎮壓的團結工會組閣執政。強硬派紛紛退位，導致東歐民運的初步勝利是以非

暴力的和平方式取得的。”（註60）

說共產黨制度在東歐沒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傳統，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捷共1948年2月一黨獨大前，按人口比例計算，為世界最大共產黨，在國會選舉為第一大黨。）其次，如前所述，筆者也認為東歐的朝野反對運動，有一定民族自決成份，但這是無足輕重的因素。再者，蘇聯的東歐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雖然蘇文沒有區別不干預（波、匈的情況）和介入（東、捷，甚至保、羅的情況）兩種不同情況。

但是，上述前兩點只能被視作背景因素，在一定的契機，才能發揮作用（其作用多少，各國有別）。問題就是這一定的契機。就此，蘇文沒有提供分析。同理，關於第三點，為什麼蘇聯於八十年代下半葉對波、匈採取不干預？為什麼它在1989年10月至12月介入東德等國事變，支持改革派推翻強硬派？這些蘇文沒有論及的問題，才是關鍵所在。

※

※

※

雖然溫輝的分析不能使人滿意，但最低限度，溫對變局所涉及的變數，大致上是有所理解的。比較之下，蘇、蕭似乎有所不如，他們的分析不僅滿佈錯誤和漏洞百出，而且就很多問題甚至完全空白。例如，溫明白需要就為什麼蘇聯和東歐會出現改革派，以及就改革派壯大的因素加以探討。蘇、蕭卻把改革派的存在和強化當作前提假定。又如，蘇、蕭僅限於申述蘇聯新東歐政策的作用，但溫進一步試圖分析為何會有這一政策形成。再如，溫明白波、匈兩個突破口的決定性作用，蘇、蕭對這點卻完全缺乏認識。

就東歐的情況，蘇、蕭全神貫注於1989年的民運浪潮。對於1989年10月以前的發展，他們似乎完全缺乏理解。就波蘭變局，他們只能說出如這類的話：“雅魯澤爾斯基更是一反常

態，明智地讓位……”。需要運用到“一反常態”、“明智”這種解釋，其實是變相承認自己無法給予問題合理解釋。至於匈局，蘇文除申述匈共經過幾十年自我改革後，最後仍走向自我否定，和就卡達爾的退位時間犯錯誤外，就沒有再作其他評述。

筆者相信，蘇文這些缺陷，部份緣於它有不同的分析主題。這點讀者應該留意。

蘇、蕭和溫輝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忽略了東歐巨變牽涉政權的更替，換言之，代表階級統治的轉變。故此，他們都沒有提出：為什麼表面看來，一個統治階級會自動放棄其統治？（註61）

一個分析的正確性，其實取決於它所提出的問題，因為後者指導和決定研究的方向。這就是方法論的問題。缺乏方法論，我們就只能圍繞表面現象兜圈。歸根究柢，蘇、蕭和溫就是由於缺乏方法論，所以沒法提出令人滿意的分析。

民陣、民聯的觀點

民陣對蘇東變局的成因，完全沒有興趣進行實質的分析。但從它的文件及其領導人的一些說話，我們可以就他們對變局的理解，得到一些眉目。

首先，民陣把中國八九民運視為蘇東變局的導火線。1989年末，民陣的《新年文告》有這句說話：

“被淹沒在血泊中的北京之春推動了1989年世界民主風潮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註62）

嚴家其在他的《展望九十年代的中國》一文說：

“六四大屠殺的直接結果，……是整個東歐的非共產主義化。”（註63）

萬潤南亦說：

“若沒有今春的北京民運，就沒有目前東歐的一連串變化。”（註64）

高泉也認為：

“蘇聯共產黨的這一變化(按：指廢除《憲法》第六條)固然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關，和國內要求獨立的民族運動聲浪滔天及東歐各國的迅猛變化也密不可分。它雖然發生在九十年代，但卻是八九民運所掀起的世界民主化浪濤的繼續和又一成功的範例……中共用坦克和機槍屠殺人民的慘景激發了專制統治下的人民砸碎專制桎梏的勇氣……八九民運促成了東歐的變化，也促成了蘇聯的變化。”(註65)

以上看法是否僅為出於八九民運失敗，聊以自慰的想象？或是沙文主義的體現？無論如何，它們都徹底錯誤，這點筆者在分析溫輝之“六四的教訓”因素，和研究蘇紹智、蕭小明有關1989年10月掀起的民運浪潮在東歐變局扮演的角色之觀點時，已論及，茲不重覆。

對民陣來說，蘇東變局是歷史潮流的產物。民陣在上述《新年文告》斷言：

“如此迅速的社會變革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它再度向全世界昭示：專制獨裁的喪鐘已經敲響，民主的大勢不可擋。”(註66)

《民主中國》雜誌主編遠志明在其《東歐的火能燒到北京嗎!?!》一文說：

“1989年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命運不濟、多災多難的一年。從中國、蘇聯到東歐各國，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民主浪潮的衝激或淘汰。這反映了歷史大勢……共產黨政權越是自覺地、主動地順應歷史潮流……。”(註67)

雖然民陣沒有就這歷史潮流加以分析，從其政治取向，我們不難想象，它所指的不外就是人們唾棄已被歷史證明破產的「共產主義」，和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追求。一句話，就是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同頁8，行16、17按語)這「常識」。

無可諱言，蘇東變局有超越國界的歷史因素存在。在這意義上，“歷史大勢”、“歷史潮流”這類字眼是沒有錯的。但口號化的宣傳和理論性的分析，屬於兩個不同的層次。宣傳上，“大勢”、“潮流”等是恰當的用語。但若缺乏深入分析加以充實，它們便流於空泛，沒有理論意義。下文第二章分析，西方資本主義在一定條件下，確實戰勝了蘇式國家資本主義。但這僅提供一個背景。問題在於如何從空泛的背景落實到對產生變局的動因，和對決定變局發展方向及過程的因素，進行具體分析。民陣不重視這項分析，是出於政治因素。既然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同頁8，行16、17按語）這變成「常識」的意識形態，迎合他們本身的政治取向，他們自然一方面樂於散播這「常識」，另一方面亦不感到有進行深入分析的需要。

再者，以上兩段引文清楚顯示，民陣的“歷史潮流”有“民主的大勢”這個涵義。下文對匈變局、波變局等的階級內容的揭露，將會使“民主潮流”、“人民力量”的意識形態性質充份顯露出來。

即使一個意識形態被接納的程度已達「常識」地步，把它運用到理性分析上，顯然有問題。建基於空洞的歷史大勢論，遠志明說：

“波蘭、匈牙利、東德、捷克和蘇聯，以和平方式向民主政治過渡。儘管這種過渡的步伐有大有小、有快有慢，但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蜂擁而至的民主浪潮衝擊下，最終沒有採用暴力鎮壓的方式，而是通過順應、妥協和退讓……。”（註68）

單說匈牙利和蘇聯兩國，其變局與“蜂擁而至的民主浪潮”之間的時間先後次序，前面已指出，茲不重覆。

高泉認為：

“中共用坦克和機槍屠殺人民的慘景激發了專制統治下的人民砸碎專制桎梏的勇氣，又令到每一個獨裁者在揮動屠刀前都要進行一番內心痛苦的爭鬥。正是這個原因，

八九年入秋之後，波蘭、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等東歐共產黨國家，一個個以和平演變的方式，開始結束共產黨維持多年的一黨專政的統治……。”（註69）

如前所述，就匈牙利和保加利亞而言，根本沒有出現過揮動屠刀的問題。至於“內心痛苦的爭鬥”，前面在討論溫輝的“六四的教訓”論點時，已有所說明。直覺是分析思維的死敵。這個所謂“六四的教訓”論點，像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同頁8，行16、17按語）一樣，仿如「常識」。《河殤》主要撰稿人、《民主中國》社長蘇曉康也響應：

“不可否認的，六四事件的影響，也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因為六四事件使得東歐共黨的領導人了解到，以武力鎮壓人民對民主改革的要求必須付出何等嚴重的代價，就在這情況下……使得東歐共黨的領導人不敢採用鎮壓的手段……。”（註70）

民陣上述《新年文告》說：

“被淹沒在血泊中的北京之春推動了1989年世界民主風潮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緊接著，不屈不撓的波蘭團結工會執政了，明智的匈牙利共產黨解散了……1989年的國際性民主浪潮呈現出兩種形式、三種結果。一類是面對人民的呼喚和感召，執政者理智地妥協退讓”。（註71）

宣傳性的文件固然避不了空泛的用語，但“明智”、“理智”顯然屬於分析性的範疇。在民陣的認識中，匈牙利共黨政權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種情況，屬於一個謎。每當一個論者遇到他無法解答的問題時，最便利的辦法，莫過於依靠唯心方法論，以人們的主觀（“明智”等）做根據。不過，沒有客觀論證為基礎的主觀毫無科學價值，這點在前面討論蘇文有關論點時已談及。假使匈共、波共等屬“明智”和“理智”，鄧、李、楊自然屬於“愚蠢”和“不理智”。這樣，歷史的發展豈非變得簡單不過，可歸納為個人問題？那歷史還有什麼需要研究？

※

※

※

中國民聯的楊漫克就東歐問題，發表過多篇文章。他在《東歐觀潮》一文(註72)，代表《中國之春》雜誌說：

“本刊通過在東歐革命過程中的實地考察，作出如下總結：即波蘭的工人，捷克的學生，匈牙利的改革家，羅馬尼亞的士兵，東德的難民。他們在各自的特殊國情中，充當了打破舊制度的關鍵角色。這個總結說明，在東歐社會變革過程中，並不存在一個所謂「中產階級」或「知識精英」這樣的必要社會條件或政治角色。”
(註73)

民陣的萬潤南等人認為，中國八九民運失敗，是由於缺少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進一步引申而言，中國民運的前途，寄望於這階級的壯大。上引後一句說話顯然是針對這個看法。不談這點，《中春》的總結本身能否站得住腳？

波蘭工人和匈牙利(共黨)改革家對波、匈兩國變局發生一定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如前所述，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匈共會自我否定？為什麼波共於1981年面對水平接近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的工人鬥爭，採取了鎮壓；而相對之下，於1989年面對水平遠較為低、規模遠較為小的罷工運動，反而採取了退讓和妥協政策？在這等問題未獲解答前，就作出總結，似乎有欠謹慎。

假使沒有波、匈兩國變局在先，和沒有蘇聯的新東歐政策，東德便不會出現變局，東德的難民(難民潮本身由匈牙利插手觸發)肯定不能“充當打破舊制度的關鍵角色”。假使沒有上述條件，加上東德沒有爆發突變，捷克的學生肯定不能觸發捷克的“天鵝絨”或“溫文”的革命，而相反必定會被嚴厲鎮壓——事實上，首先是否會出現學生奮起鬥爭也不無疑問。但凡群眾起義，遇到統治者不讓步，士兵突破其暴力鎮壓工具身份，以自身的社會層份利益出發，調轉槍頭，是成功關鍵，這

點不言而喻。但把士兵的角色放在首位，是否把本末倒置了？

不問因由地把東歐變局歸功於波蘭工人和匈牙利的改革家，和更有甚者，也歸功於捷克的學生、東德的難民及羅馬尼亞的士兵，是憑直覺作判斷，與提出天動說同出一轍。

楊漫克十分歌頌戈爾巴喬夫（以下楊的觀點，未必一定代表民聯的意見）：

“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的碩偉貢獻，顯然已確立了他在歷史上的空前地位……形象地說，戈爾巴喬夫的偉大，恰恰在於他能夠使一個龐大的超級帝國「自動退出歷史舞台」……。”（註74）

在楊筆下，戈仿若超人：

“他先在東歐各國煽風，把火點起來，然後再引向蘇聯自身。”（註75）

以前讀歐洲歷史，有學者把鐵血宰相卑斯麥廿年統一德國的事業，形容為事先已有完整藍圖。後來，史學家都否定這屬於《愛麗斯夢遊仙境》的神話般的看法。幻想終歸不是現實。匈牙利變局、波蘭變局是戈策動或煽風的嗎？

就雅魯澤爾斯基，楊說：

“這個當年已沾上血腥的劊子手，因審度潮流，及時妥協，終得以繼續作象徵意義的總統……。”（註76）

換句話說，雅是“明智”的。和楊所說相反，根據圓桌會議協議，總統職位遠非象徵式。總統有權進行法令統治；有權拒絕批准國會通過的法例；有權解散國會；有權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外交和國防歸其職權範圍。（註77）雅魯澤爾斯基履新後採取低調有其客觀因素。假若總統僅為虛位，瓦文薩1990年末就不用和他以前的智囊團就總統一職短兵相接了。以“明智”和空泛的“潮流”論為分析基礎的論者，很容易會想當然地以為，既然雅魯澤爾斯基是“明智”的，他必然明白大勢所趨，所以，他不退則已，一退便全退，做其象徵意義的總統。但事實不會依循這些論者的想象發生。歷史發展是階級利益角

力的結果，遠較複雜。

楊漫克就匈共改革派說：

“改革派，在四鄰皆陷入革命危機的當口，順應潮流，改共產黨為社會黨，放棄共產主義。”（註78）

這又是把空泛的“潮流”論邏輯，當作現實。如前所述，整個東歐變革，最先發源於匈變局，即使以匈共改組為社會黨計算，正式宣佈日期為1989年10月7日（其醞釀及決定當在此之前），當時東、捷、保、羅的突變仍未發生，又何來有“四鄰皆陷入革命危機的當口”存在？其實，楊漫克不是不知道匈共的徹底自我改革運動，始於1986年（註79），但似乎，當他一放下他作為記者的訪問紀錄後，他的分析思維便馬上受“潮流”等抽象範疇支配，驅使他無視自己訪問得來的資料，代之以想當然的想象。這點充份顯露於他“革命危機的當口”後“順應潮流”的這一句話。（註80）

經濟改革在東歐的必要性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東歐變局最終緣於經濟問題，但與溫輝的講法相反，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直接的，中間經過很多層次的轉折。

本章首先論述東歐採納斯大林模式的經濟背景，和分析這模式的體制性局限。跟著就東歐的具體情況，分析是在什麼條件下，這模式對東歐二次大戰後首十五至廿年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並且在什麼環境底下，這模式的消極作用終於凌駕其積極作用(雖然這不表示經濟增長會馬上停頓)，迫使東歐進行經改。最後論述最終的經濟問題怎樣經過中間多個層次的轉折導致變局的發生，從而給予“歷史潮流”這個抽象的講法以具體內涵。

東歐採納斯大林模式的經濟背景

國家介入經濟，非蘇聯模式的專利。自十九世紀末葉，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形態被取代。即使經過戴卓爾十一年統治，英國也沒法將歷史倒流。(註1)

為了戰爭需要，德國在一次大戰期間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進行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建立軍事壟斷資本主義(一些德國社民黨人稱之為所謂“軍事社會主義”)。由國家通過行政手段，把資源集中起來，統一配置，這是命令經濟的第一個典範。

德國的經驗有很大啟示作用。列寧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解救俄國因大戰而陷入的極端險況的唯一辦法。(註2)事實上，布爾什維克政權能夠贏得內戰，也得力於所謂“軍事共

產主義”的實施。

命令經濟與意識形態沒有關係。著名波蘭經濟學家奧·蘭格(OSCAR LANGE)便曾這樣說：

“廣泛運用超乎正常的經濟強制手段之高度集中的行政計劃及管理辦法，不是社會主義（按：即蘇聯模式）的特徵，而是戰爭經濟的特有手段。”（註3）

德國的希特拉模式及日本的東條模式都是為了備戰和作戰的需要而建立的。

斯大林1928年開始實行五年計劃，在和平時期通過國家壟斷來發展國民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註4）一些資本主義發展得遲的國家，不想淪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地，並希望趕上先進國家，紛紛把斯大林模式視為金科玉律。

二次大戰後，東歐各國經濟千瘡百孔。所有政黨一致同意國家壟斷是唯一出路。例如，捷克在1948年2月共產黨政變前，超過六成工業已被國有化（按就業人數計。若按產值計，比率會更高。見第廿八章）。1947-48年度的計劃委員會，由各黨派組成，主席是一位工業家。（註5）

斯大林模式的體制性局限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註6），建立社會主義需以消滅價值為前提。這涉及在主要生產部門以勞動時間作為經濟計算尺度。1920年期間，一些俄國經濟學家曾對如何把這種計算方法付諸實踐，作出過研究。但新經濟政策的實施（1921年3月）令這項研究不了了之。

不消滅價值，就只有以價值的表現形式——價格為經濟計算尺度。價值是一個不能觀察到的數量。（註7）而價格需要通過市場的自由交易，才能達到表現價值的水平。因此，計劃價格是一個內在矛盾的範疇。一方面無法知道商品的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取消市場，結果是計劃價格與價值背離，不能形成一定

關係。

經濟計算尺度是資源配置的根據。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時間需要轉化為價值，再而間接通過價格來發揮這個作用。(註8)不能表達價值關係的價格體系對資源配置的效益起有負面作用，造成社會勞動浪費。(註9)

所有蘇聯模式國家的經濟學家都面對以上矛盾。在不知道產品價值的情況底下，他們無法設計出一個比市場價格為優勝的相對價值體系。但計劃經濟又要取締市場。於是，他們只能試圖以降低成本的方法來提高經濟效益。但這些成本卻又需要以計劃價格為依據。換句話，如何優化資源配置始終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再者，計劃價格使評核企業經濟效益無法進行。在市場經濟，利潤是量度效益的尺度。但在以計劃價格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一個企業可能實際效益很高，但由於產品的計劃價格訂得低，卻反而要虧本。換言之，企業的贏虧不由自己控制，完全視乎國家的訂價政策。既如此，銀行貸款亦缺乏評核標準，所以也只有根據國家的指令進行資金調撥。

計劃價格令企業不能掌握自身的盈虧，使它們在不平等的經營環境下競爭，從而體制性地破壞企業的效益。這種情況使科爾奈得出舉世聞名的短缺經濟的結論。(註10)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斯大林模式是一種內在矛盾的制度。它不消滅價值，卻又要像經已消滅價值一樣實行計劃經濟。於是產生了計劃價格這頭怪胎。計劃價格沒有、亦不能打破價值規律(例如，總價格仍然相等於總價值，只是個別價格與價值不規律性地偏離)，但卻嚴重干擾價值規律的運作。這種干擾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有發生(註11)，但程度有異，在斯大林模式下最為徹底。出於這種干擾，很多衍生於價值規律的經濟範疇，如貨幣、銀行等，都無法發揮它們的正常功能。由此，斯大林本人及一些蘇聯模式國家的經濟學者，曾把這些國家中的價值、商品、價格、貨幣、銀行等，視作形式上的範疇，沒

有價值關係的實體。(註12)

斯大林模式半步也未有踏上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道路。相反，它仍然植根於價值規律。它對價值規律進行的干擾無可避免地產生以上種種體制性的經濟問題。所以，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經濟改革的方向必然是減少對價值規律的干擾。換句話，必然是朝向把經濟關係市場化。但這並不表示市場規律是不能逾越的自然法則。在一個以打破價值規律，而非對它進行干擾為前提的制度，任何可能產生的困難都會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在此情況下，經改的方向是如何完善以勞動時間為經濟計算尺度，而非減低對價值規律的干預、非回頭把經濟關係市場化。

斯大林模式： 從經濟的發展形式到經濟發展的桎梏

上述斯大林模式的體制性局限，東歐經濟學家很快便親身體驗到。1954年，匈牙利經濟學家大膽地對產品質素低、浪費、缺乏創新動力等企業效益低的各種弊端加以公開評論，並提出改革要求。以奧·蘭格1936-37年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為基礎，喬·彼得(GYORGY PETER)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

但儘管上述體制性局限很快便顯露出來，如前所述，在共產黨執政頭十五至廿年，斯大林模式對於東歐各國的經濟發展，總體而言，還起有積極作用，因而改革的壓力不大。理由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中期，東歐各國經歷著粗放發展(EXTENSIVE DEVELOPMENT——「粗放」為國內一般譯法)階段。這是一個基本工業化時期，重點在建立基礎重工業如鋼鐵等。這類工業的生產方式、所需的資源等投入產出各方面的技術知識，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大致定型，變化比較少。統一的資源調撥對發展這些工業所起的正面作用，掩蓋了蘇聯模式上述體制性弊端所起的負面作用。這期間，國民經濟發展主要

是擴大這些工業的規模。

踏入六十年代中葉，基本工業化完成，東歐進入集約發展 (INTENSIVE DEVELOPMENT) 階段。粗放發展期間，大量勞動人口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初步解決了勞動力供應問題。但出於人口增長率低，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便出現勞工短缺。於是，提高生產效率便成為首要課題。

勞工短缺迫使東歐各國把工業轉型，提高技術水平，以減低勞動力需求的增長。二次大戰前，東歐各國作為西歐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向以出口農業產品為主(捷克是例外)，工業發展受到限制，技術水平大大低於西歐。現在，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必須從西歐進口高科技生產資料。以前，出口在東歐各國屬於一個「剩餘」(RESIDUAL) 範疇。即是說，在計算各主要產品的內部供求差別後，才把「剩餘」的產品用作出口。現在，由於要輸入高科技生產資料，對西方的出口便變得份外重要，上述消極的出口政策便需要改變。

與此同時，蘇聯為了自己的利益，亦開始把東歐推向西方市場。(這點我們在論述蘇聯變局時會有所分析。)

增加對西方出口(註13)表示，出口企業要在受西方支配的世界市場競爭。二次大戰後，共產黨在東歐執政，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操縱，進行經濟上自力更生的發展(東歐陷入蘇聯的控制是另一個問題，不關眼下的討論，而這種控制也不影響東歐的工業化，屬於自力更生做法的這點)。自力更生的發展，往往跟參與國際分工的要求互相矛盾。所以，在競爭方面，很多東歐產品有這種緣於歷史因素的缺陷。加上西方國家對東歐出口諸多限制，這種競爭更是對東歐不利的不平等競爭。平等競爭對技術水平較低(西方的「微型軟件」革命更加把這個差距拉開)及受上述歷史因素拖累的東歐已是吃力的事，不平等競爭就更之然了。為提高貨品在西方市場的競爭能力，政府需要提供貿易及價格補貼。這對政府財政是沉重的負擔。因此，東歐各國都面對提高企業效益之巨大壓力(留意：影響範圍不

限於出口企業，因出口企業的原料為其他企業的產品)。

另一方面，基本工業化完成後，大力發展輕工業便提上日程。由於輕工業產品屬於消費資料，所以不民主的、依靠長官意志的資源配置便出現很多問題。產銷脫節、結構失衡或比例失調的情況，經常出現。

基於以上各點，斯大林模式的體制性弊端的負面作用便愈趨突出，造成進行經改的巨大壓力。

歷史潮流：從抽象到具體

東歐巨變顯然有著超越國界的歷史因素，但如上一章指出，“歷史潮流”這個提法有待具體化。

東歐一向落後於西歐。前面分析，粗放發展期間，蘇聯模式的積極作用掩蓋了它的消極作用，令東歐的經濟發展優越於過去，並與西歐看齊。踏入集約發展階段，問題便接腫而來。蘇聯模式的體制性局限、一向相對落後的歷史包袱、自力更生發展的反效果，全部匯聚一起，為東歐帶來極端的困難，令它在與西歐的經濟競賽中節節敗退，迫使它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

東德於1963年實行「新經濟計劃及管理體制」，成為率先發動改革的經互會成員。（有關為什麼東德會成為首個進行經改的國家，見第廿八章。）兩年後，蘇聯、波蘭及保加利亞相繼進行改革。1968年，捷克亦全面投入改革浪潮。翌年，羅馬尼亞也被捲入改革運動。但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使各國的改革紛紛剎車。唯一的例外是匈牙利。自1968年以來，它是經互會中改革得最徹底及執行改革最穩定（雖亦有反覆）的國家。這有著客觀因素。匈牙利非常缺乏資源，格外依賴進口原料，所以受踏足西方市場的壓力最大。（註14）波蘭的強大工運令波共政府難以提高剝削率，更相反需要安撫工人階級，以高消費來換取政治穩定，從而一方面削弱波蘭出口的競爭力（註15），另一方面使從西方的進口不斷標升（波蘭農業很失敗，沒法滿足國內消

費需要)。由此，六十年代末葉擴大與西方市場接觸後，貿易從基本平衡發展到龐大赤字，外債迅速累積。(註16) 八十年代的急劇改革就是這種環境迫出來的。以上當然把匈牙利及波蘭的經濟危機的形成簡化了。例如，波蘭倚重機電工程的工業結構嚴重制約著它對西方出口的能力。下文會就這些情況作出詳細的分析。筆者在這裡希望指出的是，即使同樣是踏入集約發展階段，東歐各國的具體情況也有分別，不能空泛地作出一些一般性的論斷。

匈牙利和波蘭這兩個東歐改革得最徹底、經濟體制出現最大變化的經互會國家，成為整個東歐變局的兩個突破口。

下一章分析，經改使社會生產關係及階級構成產生變化。隨著經改深化，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便出現轉變，加上其他客觀因素所產生的作用，這終於導致匈牙利和波蘭發生變局。兩國變局加上同樣緣於經濟因素的蘇聯的新東歐政策，於1989年秋、冬觸發東、捷、保、羅的突變。

可見，從最終的經濟問題，即(西方)資本主義戰勝蘇式國家資本主義，到東歐變局的發生，中間經過多個層次的轉折。沒有這種具體分析，“歷史潮流”這種提法，不獨流於空洞及抽象，更往往充滿意識形態味道(例如民陣的理解)。

經濟改革對社會生產關係及階級構成所產生的作用

蘇聯模式國家以所謂公有制為基礎。國有生產資料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實際上，官僚幹部階級是實際的擁有者。提高國營部門的效益，搞活國家經濟，最終都是為了官僚幹部階級自身利益，使它的社會霸權得以鞏固。

雖然蘇聯模式國家在國內消除了競爭，這只不過把競爭提升上國際水平。例如，儘管個別外貿公司不直接感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這種壓力其實由整個國家透過外貿及價格補貼來承擔。國際競爭迫使官僚幹部階級不斷進行積累。東歐在粗放發展期間，儘管生產效率低，剩餘價值絕對量的增加，滿足了早期積累的需要。踏入集約發展階段，不提高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用一般術語講，即不提高效益，繼續進行積累就會發生困難。進行經改，是官僚幹部階級在巨大國際競爭壓力下，為保障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作出的努力。

一般而言，經改歸納為幾個範圍：(1)企業改革；(2)體制改革；(3)價格改革；(4)擴大第二經濟(註1)。

企業改革：這些改革針對科爾奈所指出的“軟預算約束”、“投資飢餓症”等現象，以提高企業效益。一般涉及對企業放權讓利，提高它們的自主性，使它們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及經營者。

體制改革：這類改革目的在於與企業改革配套。例如，金融方面實行「撥改貸」(財政無償撥款改為銀行有償貸款)，以把預算約束硬化和減低瞎投資。

價格改革：把價格開放，以反映價值關係。一般把價格分三類：指令性的計劃價格、指導價格(一般設上限或浮動幅度限制)、及完全開放的自由價格。

企業(及體制)改革與價格改革有著密切關係。此所謂“以搞活企業為中心、價格改革是關鍵”。不開放價格，企業盈虧在自己控制範圍以外，就無從搞活企業。只開放價格，不進行企業及體制改革，首先，不能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價格；其次，只會製造機會給企業謀取暴利，對搞活企業無甚裨益。

擴大第二經濟：官僚式的統一包攬在照顧消費資料方面一向效率低，在小商業及服務行業尤為如此。擴大第二經濟，不獨能補充蘇聯模式自身的不足，亦同時對國營部門經營的市場化起有一定作用(如提高競爭性)。(在一些國家如中國，這更有助於解決就業問題。)

※

※

※

在傳統斯大林模式，官僚資本高度集約化，企業幾乎完全沒有自主權。真正履行官僚資本階級任務的集團是以主管部門為核心的幹部(按：指中央部委整個龐大架構)。其他幹部只有利用職權進行小規模的貪污活動。換句話，他們基本上屬於一種寄生體，依附在由主管部門為核心構成的官僚資本階級。當然，企業主管並非百分之百被動，他們透過對有關企業的資料的操縱，跟主管部門進行關乎計劃指標的討價還價。雖則如此，這僅屬於在力量不平等底下的迴旋空間，不影響上述結論的準確性。(上述分析詳見第一章，附註1所述著作。)

經改令統治階級的內部結構發生變化。中央主管部門向地方、企業放權讓利，使地方、企業幹部對生產資料擁有實際控制權，他們從而轉化成一個獨立於主管部門的利益集團。中國近年形成的「諸候經濟」便是一個典型例子。

這個利益集團透過對國有資本的控制權(註2)，利用經改把經濟關係市場化，通過種種途徑化公為私、以權謀私。需要留意，未進行經改前，地方、企業幹部所能夠進行的貪污活動，規模受到客觀經濟條件限制。經改的開展給予以上行徑空

前廣闊的活動場所。例如，中國進行價格改革，實行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官僚幹部以計劃內價格(多為國家補貼價)搞來緊俏貨品(以煤、鋼材等最為重要)，以高出很多的自由議價倒賣出去，謀取到的暴利，非以前的小貪污能夠比擬。除利用價格“雙軌制”外(這是中國「特產」，匈牙利及波蘭均沒有實行這種制度)，其他化公為私、以權謀利的方法、形式，數不勝數，如官商、倒賣緊缺車皮、出售匱乏貨品入口許可証、回扣、非法出口、無牌經營……。經改沒法調動國營企業正面的積極性，卻大量啟動了官僚幹部的反面才華。

這個利益集團擁護更大的改革(註3)，因為這些改革除有利於他們繼續謀私外，還能夠：(1)不僅加強他們對國有資本的實際控制權，更能進一步把這控制權逐步變成實際，乃至法理的擁有權。例如，通過企業交叉控股的股份制。另一種提議是把企業估值，資產權歸企業幹部，國家只收回利息。(註4)這種建議剛巧把中共五十年代中葉把民族資本收歸國有的過程調轉過來。(2)通過上述途徑，他們已形成完全屬於自己的原始資本。很多時，他們苦於缺乏投資門路，被迫把這些資金用作奢侈消費。更大的改革可為這些資本開闢或進一步擴闊投入市場，進行累積的空間。(3)把部份國營企業私有化或招租經營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便是這些官僚幹部，因為他們擁有原始資本，又可依靠權力關係，擇肥而噬。(4)更大的改革使這些官僚幹部在轉變中的社會生產關係中所獲得的地位，得以透過市場機制來確定、鞏固和保証。

筆者認為，當這個利益集團發展到一定成熟階段(註5)，它已經轉化成為一個雛形階級。本文把它簡稱為新興幹部(資本)階級，以對照於傳統官僚資本階級。(註6)

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和新興幹部資本階級的政治代表，分別是保守派和改革派。(按：保守派和改革派為管治集團，與上述兩個階級屬於不同範疇，儘管「社會主義」國家中統治階級與管治集團有比西方國家為高的重疊性。有關這點詳見第七

章。)當然,在蘇聯模式的生產方式及生產關係給定的前提下,兩派關於經濟問題的爭論,有一定的獨立經濟意義。改革派認為必須繼續改革,否則就死路一條,這有客觀正確性。保守派指出改革不能急於求成,切忌一哄而上,否則必定製造混亂,這亦有一定道理。其實,兩派都接受改革的必要性,因為這是為了整個官僚幹部階級的利益著想。但兩派有關改革步伐的爭論,除了是關於那一個的方案最能維護統治集團整體利益的交鋒外,意義更為深刻的是,這些爭論是這個集團內部出現階級分化的標誌。東歐自七十年代及中國自八十年代,歷史是站到改革派一邊的。(註7)為了阻撓新興幹部階級繼續壯大,保守派代表傳統官僚資本階級處處企圖拉經改後腿。但客觀形勢使然,這不外是它在受到歷史淘汰的敗退中作出的負隅頑抗。因為即使它自己亦深切認識到,要回到傳統模式是不可能的,那只會令官僚幹部階級走向滅亡。這是保守派所面對的它無法解開的矛盾。

查實,並非所有地方、企業幹部都擁護改革。因為改革把一些幹部(以低層幹部為主)的小貪污途徑堵塞了。(註8)例如,政府把小商販經營放開,會削減操審批、發牌大權的幹部的貪污機會。又如,開放價格使部份貨品的短缺情況得以紓緩,國營商店低層幹部便會因而少了發財門路。再如,競爭能力低的企業自然對削減國家照顧的改革措施有所保留。這些幹部構成保守派在建制內的社會基礎。不過,與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同一命運,客觀經濟形勢的壓力透過經改的效果不斷把他們的力量削弱。

綜合上述,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政治鬥爭,實際上有著一個唯物基礎,即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和新興幹部階級兩者之間的利益矛盾。經改的歷史愈悠久,歷程愈相對穩定,內容愈徹底,新興幹部階級的力量便愈壯大。

概括之,改革派的冒起和壯大是透過一個循環的過程發展的。客觀經濟形勢的壓力使改革派在黨內抬頭。改革使新興幹

部階級強大起來。這反過來再加強化改革派在黨內的實力。研究人的行為，必須給予它客觀解釋，否則沒有科學價值。以“良知”、“明智”或其他類似範疇來理解改革派的角色，不外乎是一種宗教式（“光明戰勝黑暗”）的歷史觀。

新興幹部階級對共產黨專政有著曖昧的態度。它在初期形成及發育階段，要依賴這個政權來發展自己。在這階段，它政治上的需要是爭取改革派在建制內強化。長遠而言，它的利益在於擺脫透過這個政權來保障自己的發展和地位，以市場機制代替它來發揮這種功能。一旦這個政權維持下去，一旦保守派就有機會代表傳統官僚資本階級開改革倒車，或最低限度，剎改革車，從而束縛和掣肘新興幹部階級的發展，或甚至扼滅它於萌芽或雛形狀態。再者，共產黨政權維持下去令新興幹部階級新獲得的階級地位在人民心目中來得不光采。由此可見，這個階級的發展愈趨成熟，其翅膀愈加豐滿，它對共產黨政權的依靠便愈低，它便愈有能力放棄這個政權。同理，到這階段，它亦沒有需要把自己局限在共產黨內找改革派做政治代表。它更可進而扶植黨外的反對力量，雙管齊下，進一步促進自己的利益。

新興幹部階級對共產黨政權的態度，還受到其他因素左右。例如，其他階級的動向、國外形勢（註9）等。這些因素所產生的作用待我們就波局、匈局進行具體分析時才作出討論。

不從新興幹部階級的發展，以及就上述各錯綜複雜因素對它與共黨政權的關係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是無法理解為什麼波、匈改革派會促使共產黨和平地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

經濟改革不獨滋生新興幹部階級，它同時造就民營資產階級的興起。（註10）

一般而言，民營經濟在工業、金融業及其他大型生產所佔的比重，微不足道。（註11）它主要集中在小商業、運輸業、個人服務業等。基於勞動力短缺，民營經濟在匈牙利和波蘭的發展受到很大掣肘。雖則如此，變局發生前，匈、波兩國的民營資

產階級不僅在以上行業佔有不容忽視，甚至主導的位置，在工業亦佔有一席位，構成一股有一定實力的社會力量。它的目標在於尋求政府繼續進行改革開放，最終達到打破官僚資本在大工業、物資供應、金融信貸等方面的壟斷，以便進一步拓展自己。

所有階級都謀求組織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維護它們的經濟利益。民營資產階級當然也不例外。

政治上，東歐各國屬於單元社會，共產黨壟斷政權。前面分析，共產黨內部分成兩大派，代表著兩個不同階級。由於社會其他階級不能自由地，或只能在受到諸多限制的情況下，在黨外組織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所以，它們有需要在黨內找代辦。從這個角度看，黨內改革派有著二重角色。它不獨代表新興幹部階級，也同時代表民營資產階級。當這兩個階級利益一致時（例如，要求更大的改革），改革派的身份不會出現矛盾。但當這兩個階級的利益，或在一定的局勢下，政治取向上出現分歧時，改革派便會面對一個內在矛盾的局面。（註12）一般來說，當這種情況出現，它會以新興幹部階級的利益為重。理由是，若經改仍屬初步，民營資產階級力量微弱，不足以令改革派違反新興幹部階級（正式來說，這段時期，它屬於利益集團多於雛形階級）在這階段需要維護共黨政權的要求。倘使經改已有很大發展，出於新興幹部階級的勢力必定大於民營資產階級，改革派仍然會以前者的利益為優先。

民營資產階級除了在共產黨內找代辦外，還致力於建立黨外政治力量。這股力量與黨內改革派的關係完全視乎後者在一定的形勢下能否代表民營資產階級的利益。（註13）

※

※

※

歷史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這不是共產黨的教條，而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結論。所有政黨、派別、政治力量都是一定社會階級的利益代表者。它們之間的政治鬥爭不外是這些階級的經濟

利益角力政治上的體現，非什麼“明智”對抗“愚蠢”、“良知”對抗“罪惡”等。這些政治鬥爭的勝負取決於各個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非什麼“認識的深化”等。現象不能告訴人們事物真理。單看表面，我們只能見到各黨各派的關係轉變，只能根據有關人物的言談判斷他們的主觀自覺。但是，這些轉變及主觀自覺都不能為我們揭示它們的深層客觀基礎。

